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影响历史进程的 100 本书

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书
《老子》

一位美国学者预言说，中国的《老子》将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前几年，美国的《纽约时报》又把《老子》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名作之首。这部诞生于遥远的春秋时期哲学著作，迄今仍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博得东西方学界的一致青睐。

《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与孔子同时代，但出生略早。他是春秋时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现在通行的《老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下篇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后人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将《老子》称为《道德经》。

《老子》以诗歌的形式，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它标新立异，自成一家之言。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最早创立了“道”的理论，把“道”作为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使有“上帝”，“道”还是上帝的祖先。天地万物都是效法“道”而自然而然地变化着的。这些观点无疑具有无神论的倾向，然而，老子又认为人对自然是不应有所作为的，一切应听其自然，无为而治。

《老子》中具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例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天下的人都知道怎样才算美，这就有了丑了；都知道怎样才算善，这就有了恶了。所以有了有才生无，有了无才生有，有和无是互相产生的；因难见易，因易见难，难和易是互相造成的；长短是互相比较出来的；高下是互相靠拢对比出来的；音与声也是互相对立又互相倚靠的；前与后要彼此排列起来才看得出次序。”显然，老子已意识到事物永远在矛盾对立中运动变化着，也意识到难易、长短、大小、刚弱等相互转化的法则。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以至万物变化的情况，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老子》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见解。例如20世纪初，一些科学家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上提出了“大爆炸说”，认为宇宙起源于超高温、超高密的一团混沌的“宇宙蛋”，它因某些原因突然发生大爆炸，各个碎片向四面八方飞去，形成了无数的星系。这一理论与《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沌，先天地生”的说法，有一定程度的相符。因此，当代一些学者认为《老子》中“道”的思想体现了“宇宙大爆炸说”的萌芽，从而对它更加推崇备至。

《老子》一书文词十分简约，然而内涵深奥，精微玄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以从中找到各自的“根据”，所以它几乎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过《老子》中的话，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批判地改造和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尽管人们对《老子》褒贬不一，然而它深玄莫测的含蕴，长久不衰地激发着人们的兴趣，那透过表象从反面闪耀出的智慧光芒，至今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迪。由于对它如谜的真谛，谁都无法一锤定音或一言蔽之，所

以，也许它真是一本属于未来的书。

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失败后偶而读到一部中国兵书，他连连叹惋说：“可惜 20 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令威赫一时的德皇遗憾不已的这部中国兵书，就是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孙子兵法》。尽管它事实上不可能挽回威廉二世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失败的命运，但这部兵书内容的精博深湛，的确使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折服倾倒。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它是当时诸侯兼并、战争频繁以及诸子百家学术争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其奠基人是齐国人孙武，他曾以兵书见于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威震诸侯。现存的《孙子兵法》是经过三国曹操删定编注的，分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等 13 篇，故又称为《孙子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一个广博精深而比较完整的军事学体系。无论是论述战争、战略问题，还是论述作战方法问题，以及论述治军带兵问题，处处都显示了唯物全面的分析、深刻辩证的见解和现实开明的主张。

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不主张穷兵黩武，轻率用兵，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划谋，其次代交，再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还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呀，所以，领导战争的上策，是在总的计谋上战胜敌人，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再次是进攻敌人的军队，下策是攻城。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

对于作战指导，孙子强调主动灵活。他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而争取主动的关键在于注重了解和正确判断情况，“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战都有危险了。）

在我国 2000 多年的战争史上，这部《孙子兵法》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无数惊心动魄的战例，都反复地证实了它的高超卓越和神机妙算。尽管也有死背兵法，墨守成规的惨败教训（如三国马谡失街亭），但更多的则是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经验。书中许多论说，已经流传为著名的军事格言。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有十倍优势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的优势就进攻敌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等。

这部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兵书，一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日本人推崇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典”。它早就被译成英、俄、法、德等十几种文字，传播到国外，据说拿破仑在战争中就经常披阅《孙子兵法》。即使以现代的目光来审视这部古代兵书，我们仍可以欣喜地发现，书中许多合理内核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它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曾将《孙子兵法》规定为 1990 年度所有陆战队官兵的必读书。1991 年初的海湾战争时期，驻海湾

的美国陆战队官兵争相阅读《孙子兵法》，并根据其“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思想，改变了传统的硬拼作风，尽力避免与伊拉克军队正面对抗，一位美军将领说：“这是纯粹的孙子兵法”。同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与思想，也已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企业管理、商业竞争、体育竞赛等活动中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佛教典籍的总集——《大藏经》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前 5 世纪的古代印度。相传当时释迦族净饭王太子悉达多，为寻求解脱世界苦痛的办法，放弃王位，出家修行。6 年之后的一天，他盘腿坐在一颗菩提树下苦思，终于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获得了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教徒们尊称这位佛教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虽然在印度本土传教达 40 年之久，但是他生前并没有将其佛教学说整理成文。释迦逝世的当年（约公元前 485 年），他的弟子们，以摩诃迦叶为首的 500 人集会，采用集体忆诵、讨论的方法收集整理释迦的言论（佛教称为结集）。当时，由阿难陀诵出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称之为“经”；由优波离诵出释迦牟尼为信徒们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称之为“律”；由摩诃迦叶诵出有关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称之为“论”，由经、律、论组成的一整套佛教典籍丛书，就是大藏经，也叫“一切经”，或“三藏”。其中的经藏，就是现存的《阿含经》，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佛祖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所以有“根本佛教”之称，它是早期佛教的最基本的经典，也是今天探究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历史渊源的最基本的素材。

佛教经籍在释迦牟尼逝世当年第一次结集以后，先后又结集过 5 次。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文七个系统。《汉文大藏经》在唐宋时代，收经、律、论计 5000 余卷，现在编印的《中华大藏经》多达 23000 余卷。

原始佛教经典的基本教义是宣传“四谛”和“十二因缘”。四谛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分别阐述现实世界的痛苦现象，造成痛苦的原因，佛教最后理想的无苦境界，以及实现佛教理想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佛教认为现实世界一切皆苦：生苦、死苦、老苦、痛苦、受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真所谓苦海无边，这些痛苦都是由十二因缘引起的。十二因缘之首是无明（即愚昧无知），所以消除痛苦的途径在于消除无明，求得觉悟，而世人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摆脱苦难的道路。此外，佛经还主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宣称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在不断的轮回（天、人、魔鬼、畜生、饿鬼、地狱）中生活，一个人今生的行为，若是违背佛法，来世就要变成饿鬼畜生或堕入地狱。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翻开印度、中国、日本、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佛教一度极为盛行。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里，佛教是“国教”。据 70 年代的一份统计，在泰国，佛教徒占 90%以上，僧侣达 26 万人；在缅甸，佛教徒占 80%以上。诵经拜佛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了。现在，全世界的佛教徒至少有 2.5 亿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习俗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唐僧取经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佛教的传入和普及，丰富与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对中国哲学的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展产生巨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名著，都有不少佛教、佛经的内容。当然，佛经中的悲观厌世、因果报应思想以及对佛、菩萨、神鬼的迷信等，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文化的发展中，无疑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半部书治天下——《论语》

你听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吗？北宋政治家赵普是开国元勋，曾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朝宰相。一次在与宋太宗谈政的时候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薄薄的一部书，半部而可“打天下”，半部则可“治天下”，其作用与影响，实在是亘古未有的。

《论语》主要记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言行，由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集成，是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全书共 20 篇，每篇取第一章中的两字或三字作为篇名，如《学而》、《为政》、《公冶长》等。《论语》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故后人认为编纂成书当在战国初年，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它是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的重要资料。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人。生于公元前 551 年，也就是鲁襄公 22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也就是鲁襄公 16 年。是儒学派的创始者。他是我国古代一位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生当“礼崩乐坏”的奴隶制末期，他周游列国，想用自己的一套学说挽救天下的危亡。他学说的基本核心是讲“仁”和“礼”。他对于“仁”字有很多解释，其基本的意思是“爱人”，他说：“仁者，人也。”（见《礼记·中庸》）因此，他主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我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来对待我，我也不这样对待别人），要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统治者要节约用度，爱惜财物，同时也爱惜人；役使人民的时候要按着时节），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他反对奴隶殉葬制度，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引，意思是说：第一个想出以俑作为殉葬的人，是没有后代的。）由此可知，他的“仁”，包含了一种要求把人当作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奴隶社会把奴隶不当作人，可以任意地出卖、杀害，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由此出发，他要求对当时奴隶的政治作某些改良，从这方面看，孔子的关于“仁”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但他除了“仁”的思想以外，也提倡“礼”，“礼”的基本作用是要维护旧的等级制度。当他把“仁”的思想具体化到君臣、人伦关系上去的时候，则又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行不通的，腐朽透顶的奴隶制，当时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当时历史要前进，就要摧毁奴隶制；可是孔子却不认识这一点，因此他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虽然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积极态度是颇为感人的，但他在政治遭遇上确是一个失败者。他一生除了仅在鲁国作了几个月的司寇以外，只是以讲学授徒毕其一生。

但孔子在当时文化的发展上，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提出“有教无类”，是第一个以学者的身份聚徒办学的人，使从前掌握在官府的文化普及下来。他一生弟子众多，据说听他讲学的有三千人，其

中关系亲密而又著名的有七十二人。另外，孔子还在认真地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化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论语》所记述的就是他平时与弟子们在一起讲学论道的言论，所谓“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一书，从内容性质上说，它属于一部语录体的思想、学术著作。但由于这些语录的记述者们，在记录的时候往往把孔子（包括他的弟子和其他的一些人）的某些仪态举止，说话时的感情、口吻，以至音容笑貌都一起描绘出来，很能够显出人物的性情、感情和性格，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学特征。如《阳货》：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由对曰：“昔者偃（子由的名字）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有一次，孔子往武城去（他的弟子子由正在那儿做官）听见有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就微笑了一下，说：“杀鸡何必用牛刀呢？”（意思是说：治理这么一个小国，还用得着礼乐吗？）子由回答说：“我从前听老师讲学时曾讲过：‘君子学了礼乐的道理就会爱人，老百姓听了礼乐之道就容易听指挥’。”（意思是说：礼乐之道对君子和老百姓都是用得着的。）孔子马上对周围的学生说：“子由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所讲的话只是玩笑而已！”这里写孔子的弟子在武城作官，按照孔子日常的教导，施行礼乐教化；而孔子却随口开了句玩笑，说他杀鸡用牛刀，无须这么小题大作。当弟子不能心服地反问时，他又赶紧改口，加以纠正，说前边的话不过是随口而出的玩笑。虽是几句话的小片断，但口吻逼真，情趣盎然。

又如《述而》：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这是孔子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孔子对颜渊说：“启用我，我就去干，舍弃我，我就隐藏起来，这样的抱负只有我和你才有的吗？”子路在旁边听后插话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你和他是一样的，但如果你要指挥三军的时候，你和谁共事呢？”（“三军”，即军队，春秋时，大的国家都备有三军：中军、上军、下军，而以中军的将领统率三军，而子路是勇于打仗的人。）孔子就回答说：“空着手和老虎搏斗，没有船而淌着水过河，死了而不后悔，象这种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我一定要找碰到事情小心戒惧，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共事。”这里记孔子与弟子的一段对话。孔子在弟子中最喜欢颜渊，赞许只有颜渊能与自己共事，而子路却不服气，问孔子如果作三军统帅将依靠谁，子路性格率直，好勇自负，认为颜渊也有不如自己的地方。结果孔子把他顶了回去，并重申了自己的意见。短短的片断，把孔子对颜渊的独美，子路突然插言不服气，和孔子对子路的耐心批评教育，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又，如《子罕》篇记述孔子与子贡的对话：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子贡姓端木，名赐，当时的卫国人，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说：“有一块美好的玉石在这里，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出去呢？”孔子就说：“卖掉它！卖掉它！我是在等着商人把我卖掉啊。”子贡

是孔子的一个聪明而善辞令的学生，这里写他用“隐语”跟孔子对话，用美术比喻有才能的人，问一朝碰见赏识的人，该怎么办？孔子是一位积极用世的人，他接着也用隐语马上回答说：卖掉，卖掉，我就正是正等待识货的哩。语句衔接急促，表示出孔子急切的感情。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得到某一统治者的赏识而施展他的抱负，所以，当子贡这样一问，他的心迹也就流露得很急切，对语和比喻之句也极饶风趣。

书中记述孔子与阳货打交道的一段描写，更是生动的一章：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同馈）孔子豚（tún 屯）。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qì 气）失时，可谓知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愿意见他，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小猪（按当时礼节，一个人受了别人的礼物要回拜）。孔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就去回拜。在半路上孔子还是碰到了阳货。阳货就对孔子说：“你过来，我和你说句话。”孔子过去后他又说：“你作为有本领的人，而使国家处于混乱中，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不行。”阳货又说：“自己是好参与政事的而屡次失去机会，这样的人能够算作是智的吗？”孔子回答说：“不行。”阳货又说：“光阴一天天地过去，年岁是不等人的。”孔子于是说：“好吧，我将要做官了。”阳货，又叫阳虎，当时把持鲁国政治，想拉孔子做他的帮手；孔子不愿意，又不便严词拒绝。他先是采取阳货上门不见，等阳货不在家时再去回拜的方式躲避他。他不巧又“遇诸涂（途）。”在谈话中，阳货态度很倔傲，又用孔子一贯所宣称的仁、智主张来诸问孔子，孔子的回答似乎完全顺从阳货的意见，实际是敷衍他。孔子的答话都很简短，那种不得已的敷衍态度活跃然如亲见。这一片断的记述很有戏剧性。

《论语》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向来为人们所传诵，即《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这段文字是记述孔子与他的门徒们的一次较长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孔子问当时在坐的子路（仲由）、曾皙（点）、冉有（求）、公西华（赤）各人的志向如何？首先写孔的问话：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孔子说：“因为我的岁数比你们稍大些，不要使你们感到拘束了。平时你们常常说：别人不了解我。假如有人能够了解你们，那么你们将怎样去做呢？”这里孔子并没有开始就直接提问，而是先用谦和的口气，解除弟子们在老师面前可能会有的顾虑，又引出学生们平时的牢骚话（“不吾知也”）来敦促和启发学生们尽情地畅谈自己的志向。显示出子循循善诱的态度。接着写“子路率尔而对”，即抢先匆忙地发言。他毫不谦虚地把他能治国安邦的本领，用极夸大的言辞讲了出来。他说完话后，“夫子晒之”，夫子含有深意地微笑了一下。简单地两句记叙性的词语（“率尔”、“晒之”），却活现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情、态度。

下面是孔子挨次地让冉有、公西华、曾皙谈话。冉有、公西华的话说得比较虚谦，冉有说，他只能使百里之国丰衣足食，而施行礼乐教化的事，自己却作不到。公西华表示，自己只能在诸侯祭祀、会盟时作个“小相”（司仪）。孔子只是静听，没有表示态度。最后，轮到曾皙回答，文中是这样写的：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暮春”，指暮春三月，已穿得住夹衣服了。“冠者”，指成年人，因为古时候到成年要行冠礼。有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孩子，到沂水那儿去洗澡，到舞雩台乘凉，唱着歌一起回来。孔子听后叹息地说：“我是赞赏曾点的”。这里写曾皙正在鼓瑟，听到孔子向他提问，便舍瑟而起，由于他所想的不同于前三人，因而颇为迟疑。经孔子的温语催促，他从容不迫地述说了自己的志趣。而孔子听后，却发出由衷的赞许。孔子平日教育学生的都是治国安邦的理想，前几人所答的虽然志向大小、态度傲谦有不同，但讲的还都是“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的问题，即如果得到国君的信任，在政治上有何抱负，唯独曾皙答非所问，讲了一通投身大自然，过悠闲自在生活的乐趣，这离开了政治。而孔子竟“喟然而叹”，赞许了曾皙。为什么呢？这段描写实际反映的是孔子某一方面的思想感情。孔子在后世封建社会曾被推为“万世师表”，是不可一世的大圣人，但孔子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颇不得志的政治家，他周游列国，四方游说，实际却处处受冷遇，一生坎坷。所以也不免有愤世嫉俗的苦闷，以至产生去过自甘淡泊生活的理想。他曾表白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心迹。而曾皙所表示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说正与孔子这类心情相一致，因而有所共鸣。因为孔子虽是一个积极的用事者，但在屡受挫折后，也会产生希望过一种自甘淡薄的生活。

这章短文虽只有三百字左右，但描写人物的语默动静却很传神。孔子与学生在一起时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坦率而自负，冉有、公西华的谦逊，曾皙的志趣高远和性情淡泊，都一一勾勒得十分清晰、生动。而末后曾皙的一段话，非常形象地描画出一幅阳光和煦，春回大地，一群性格活泼的青少年，一起沐浴乘凉，融融乐乐，载歌载舞的游春图。这种刻划精细和诗意盎然的散文，可看做是我国记叙散文的萌芽。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记孔子言语的，虽然只是孤立的三言两语，但很能传达出感情色彩，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孔子有一次在河边上站着，看着河水有所感叹，说：“消逝的时光就象流水一样向前流去。”“斯”，指河水。“夫”，是语气词。“不舍昼夜”，“舍”，停止。日夜不停地流去。

另外，在《先进》篇里还记载孔子在听音乐后说的话：“子在齐闻韶（古乐曲），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孔子有一次在齐国听韶乐，“韶乐”，古时相传舜时的一种古乐，这种古乐很好听。“三月不知肉味”，很长时间吃肉嚼不出滋味。“三月”，泛指时间长。“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古人创造音乐，竟然达到如此迷人的地步。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颜渊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先孔子而死，孔子非常难过。“噫”，啊呀，表示感叹的语气词。“天丧予”，老天爷真要我的命。

第一段记孔子在河边看到日夜奔腾的流水，因而产生了伤逝哀叹之情，感慨的语气，怆然若失的感情记录得惟真惟肖。第二段记孔子一次听音乐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感受，其赞叹之情，跃然纸上。第三段写孔子的爱徒颜渊死，孔子伤痛欲绝，如睹其顿足惊呼之状。

《论语》中还有许多语录，简明深刻，包含了丰富的生活经验，被后世一直作为格言传诵，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等，皆语言简洁，深入浅出，语约义丰。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语言浅显简练，用意却很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显然，这已不仅是单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格言式语录了。类似这样的警句，《论语》中还有不少。

由于在整个封建时代，尤其是汉代以后，孔子开创的儒学始终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因此，作为儒学主要经典著作的《论语》，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自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封建士大夫和莘莘学子的必读书，无论是精华面还是糟粕面，都深深地渗透进政治、道德、文教等各个领域里。它既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国民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又被历代权势者扩大与利用其中的消极面，改造成为统治与奴役人民思想的手段，这种同样明显的正负社会效应，就使对《论语》的评价众说纷纭，甚至尖锐对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论语》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而且其影响已越出国界，遍及东方乃至世界。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简直是“汗牛充栋”，仅日本学者林泰辅博士在《论语年谱》中所著录的就达 3000 多种。

世界是永恒的活火——《论自然》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最美丽的猴子与人比起来也是丑陋的。”

“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上面这些富有哲理色彩的语录体论述，出自于赫拉克利特的《论自然》一书，这本著作收有他类似的残言片语 130 多则。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他说：“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象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而火与万物的转换变化都是按照必然的规律进行的——“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照规律燃烧着，按照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赫拉克利特的这段话，以朴素的、生动的、新颖的方式，完整地表达了希腊早期唯物主义和早期辩证法相统一的思想，所以列宁称赞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的，宇宙间不存在静止和常住不变的东西。他提出过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时，它已经不是你第一次走进时的那条河流了，原来的那条河流早就变化了。赫拉克利特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画出了一幅万物都处在产生、流动、变化、消灭过程中的世界图景。思格斯对此评论说：“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达出来的。”

那末，为什么世间万物会永远流动，永远变化呢？赫拉克利特指出，世

界是由许多彼此间进行着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他说：“在我们身上，生和死，醒和睡，少和老，都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事物运动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是辩证法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在欧洲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第一个提出了这种看法，因此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赫拉克利特的自然辩证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承认真理的具体性，承认真理以一定条件为转移。例如，他说：“海水是最纯洁的，又是最不纯洁的。对于鱼，它是能喝的和有益的；对于人，它是不能喝的和有害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比起来也是丑陋的。”

赫拉克利特的这些著作残篇，言简意赅，闪烁着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光芒，千百年来，为众多哲学家们所引用和阐述，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历史》

“垂训后世”是古希腊史学家修史的宗旨。希罗多德也不例外。他自己说，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这部著作主要记述公元前 6 世纪至前 5 世纪希腊诸城邦和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所以也叫《希腊波斯战争史》。它大约在公元前 430 年问世，在西方向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因此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这一美名也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有关希罗多德的生平，现在所知甚少。他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城，约公元前 484 年—公元前 425 年在世。他因反对本城的僭主吕戈达米斯而被放逐于萨摩斯岛。后来返回故乡，赶跑了僭主，但又因与国人不合而再次离乡背井。希罗多德游历过埃及、巴比伦、黑海沿岸等许多地方，所以后人又称他为“旅行家之父”。广博的见闻为他著述史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历史》共分 9 卷。1—5 卷的 28 章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历史、地理及民族习俗、风土人情；从第 5 卷 29 章起，主要叙述公元前 478 年以前的希波战争。每卷各冠以一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因此后世又称其为《缪司书》。它内容丰富，是研究古希腊史的十分重要的材料。

这部史书的笔调流畅，富有文采，虽然书中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语言生动，因此许多人又将它当文学作品来阅读，它是古希腊史籍中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下面是关于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的一段叙述——

在早上，直到市场上挤满了人的时候，他热心地处理送到他面前来的事务；在这之后，他全天便都用来和他的好友饮酒作乐，吊儿郎当地和言不及义地排遣时间。但是他的朋友为他的这一点担心，于是劝谏他说：“哦，国王啊，你的这种轻佻的行动，是会损害你的国王尊严的。我们希望你终日严正地坐在威严的宝座之上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埃及人就会知道，他们的统治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你在他们中间也就有了更好的声名；然而你现在的行动却是和国王完全不适合的。”阿玛西斯回答他们说：“要知道，有弓的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拉开的；如果弓老是拉着，它们就会毁坏，而等人们

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用处了。人的道理也和这个道理一样。如果他们总是从事严肃的工作，而不把一部分的时间用来消遣，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便会疯狂起来或是变成傻子，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我轮流着分配两者的时间。”

《历史》中了记载了不少荒诞无稽的传说，当然不可全信，但另有不少记述却是希罗多德亲自调查得来的。在欧洲史坛上，他最先对史料采取一定程度的分析批判态度。作为古希腊史学的开山之作，《历史》在欧洲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古希腊大战亲历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公元前 431 年到公元前 404 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为争夺希腊地区的霸权，发生了一场大战。第一阶段斯巴达陆军攻入亚提加，雅典海军则活跃于南希腊海一带，互有胜负，最后订约停战。第二阶段雅典远征西西里惨败，斯巴达在波斯的帮助下，装备了数百艘战舰，诱使雅典舰队进入伏击圈围歼之，180 艘雅典战舰只逃出 8 艘，斯巴达获得最后胜利。这场战争是希腊历史的转折点，参战双方在人力、财力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希腊社会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

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这场大战的目击者和参加者。公元前 424 年曾任雅典将军，在安菲城战役中，因驰援不及而遭放逐。20 年后返回雅典，潜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著述。他以亲身经历和访查，较翔实地记述了公元前 411 年以前的大战经过以及当时人对一些政治事件的看法，为后人研究古希腊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是这样写作的：“ 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可靠的。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

修昔底德确实要比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高出一筹，他不但是第一个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史学家，而且是第一个尝试揭露历史事件发展中的真正因果关系的史学家。当时有些史学家常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单地归纳为诸如“ 劫走一个妇女”之类的偶然事件；而修昔底德则力图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例如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来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嫉妒以及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恐惧。这一见识显然比其他史学家深刻得多。

修昔底德对于神谶和灵详灾异之说持否定态度，不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历史，这在古代历史学家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例如尼西阿斯因为月蚀而迟误了撤军的日期，以致全军覆灭，修昔底德在书中沉痛地谴责了他的愚蠢。

这部《战争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精心编撰的演说词约占全部著作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些演说饱含哲理、富有文采，与整个叙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巧妙地说明了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

《伯罗奔民撒战争史》以较强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叙述希腊奴隶社会正在

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集团间以及阶级间的矛盾，是世界史学文库中的杰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引述过此书，并且说，这是“令人感到新鲜”的书。

哲学王当主宰的等级社会——《理想国》

柏拉图是古希腊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在哲学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柏拉图一生，以对话体形式，写了30篇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想国》（一译《国家篇》），此外有《美诺篇》、《斐多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法律篇》等等。

柏拉图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而可感觉的实物世界是第二性的和从生的。在柏拉图看来，实物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一切真实的知识不过是永恒的灵魂对理念的回忆而已。柏拉图将他的唯心论哲学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就造出了他的“理想国”。

《理想国》阐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道德、政治、教育学说。他认为民主制是国家制度的低级形式，贵族共和国才是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理想制度。在柏拉图看来，道德生活的最高表现（智慧和勇敢）只有某些杰出人物，即贵族奴隶主才具备；庶民只能有服从的道德（节制的美德）；至于奴隶，柏拉图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否认他们有任何道德生活。他认为由贵族奴隶主所统治的“理想国”是正义的美德的体现者。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他们是管理国家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勇敢的武士，他们是“雇佣的监视人”，负责保卫国家；第三等级是农业劳动者和手艺人，他们为国家生产一切必需品。柏拉图认为这种使剥削奴隶的制度永远巩固下去的分工是“自然的”和不变的。

柏拉图划分三个等级的理论根据是“神以各种金属造成各种不同的人”。神以金子造成具有统治能力的执政者（哲学王），以银子造成辅助者（武士），以铜和铁造成农夫和手艺人。一个人属于哪一种，他所生下来的子女也就属于哪一种。而一旦钢铁作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因此，“国家大事中最大的事”，就是对第一、第二等级即统治阶级的儿童和青年进行严格而系统的教育，挑选和培养统治者即“哲学王”。柏位图的著作中，人性论、天命论、血统论、天才论等等是直接融合在一起的。

柏拉图还主张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者应当说谎，也必须说谎。凡有利于统治的谎言是“高贵的”或“光荣的”谎言。这些谎言也许第一代人不大可能相信，但只要待久地宣传和教育，下一代以及以后的一切世代是会坚信不疑的。这套“不说谎话就不能成大事”，“谎话不断重复就成了真理”的谬论，成了一切腐朽政客的原始信条。

总之《理想国》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论述加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方案，为当时和以后的剥削阶级的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曾指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不过是埃及等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直到20世纪，西方哲学家仍将《理想国》誉为“他（柏拉图）那个时代文化的最高代表作”，“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佳世俗思想”。

“逻辑之父”的逻辑巨著——

《工具论》

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为数不多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们的博学与睿智，至今令我们钦佩不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便是一位这样的大学者。他的杰出贡献遍及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动植物学和美学等各个领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科学水平。因此，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他为“最博学的人物”。

《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的汇编总称。由于当时认为逻辑学既非理论知识，又非实际知识而只是知识的工具，所以后人将此书命名为《工具论》。全书包括六篇——《范畴篇》，讨论实体、量、关系、质等问题；《解释篇》，结合词语、语句讨论判断或命题；《前分析篇》，讨论推理的有效性、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后分析篇》，讨论证明的条件、种类、方法和构成因素，以及定义和证明的关系等；《论辨篇》，讨论论辩的艺术、推理的方法等，《辨谬篇》，专门培析和驳斥各种谬误和诡辩。

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在西方逻辑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了人类思想的形式和规律问题。他在总结、概括当时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先驱们有关逻辑的一些论述，以认识真理反对诡辩为目的，在西方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科学的类型。

亚里西多德正确地指出：思想的真或假，决定于它是否和现实相符。在《工具论》中，他第一个将概念分类，得出十个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中心内容是推理，他提出了演绎和归纳这两种逻辑的方法。演绎法是由普遍的原理推论到个别的东西，归纳法则由许多个别的事例推出普遍的原理。简单的演绎推理形式就是三段论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自己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发现了三段论。所谓三段论就是由（一）大前提（二）小前提推出（三）结论。例如由“凡是人都要死的”（大前提）和“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可以推出结论“苏格拉底是要死的。”他在《论辩篇》中提出四种推理：证明的推理、辩证的推理、强辨的推理、谬误的推理，在《辨谬篇》中又提出了四种论证。其意图是探索哪些推理论形式是有效的，哪些推理形式是无效的，从而为人类的科学思维提供认识真理和表达思想的有效的工具和武器。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等著作，为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现在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2000 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都已经规定下来了。因此，人们尊称他为“逻辑之父”。

中国史学划时代的巨著——《史记》

一部煌煌伟著的诞生，常常何其艰辛而曲折！司马迁以十多年的时间，风尘仆仆，游历名山大川，调查古迹遗事，扩充历史知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38 岁任太史令后，又广览皇宫图书秘藏，正当他潜心著述历史名著《史记》时，一场飞来横祸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汉将李陵抗击匈奴，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了几句，不料却触怒了汉武帝，因之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又被处以腐刑——割除生殖器。身受“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的奇耻大辱，司马迁隐忍负重，呕心沥血，终于在公元前 91 年完成了 52．65 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而他的矢志不渝，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同他的伟著一起，光耀史册，千古传颂。

中国的史书，从《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到司马迁

的《史记》，无论著作的规模上、体例上，以及历史散文的发展上都是一个飞跃。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已经有若干历史著作了。一些早就散遗的古史不必说，现在还可以见到的，象以文告形式保存下来的类似政治史的《尚书》，以年代为序的编年史《春秋》，和同样以编年体叙事并间写历史事件的《左传》，还有以国来记事的国别史《国语》、《战国策》。这些史书虽然各有特点，但在《史记》之前还没有一部体例比较完备、内容丰富、思想倾向鲜明、散文艺术高超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

《史记》是中国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有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全书共一三 0 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 本纪 ” 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 表 ” 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 ；“ 书 ” 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 ；“ 世家 ” 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 ；“ 列传 ” 为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记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这五种体例，互相补充配合，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都是以写人物为主的，这种用纪传体来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开创。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 “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所谓 “ 究天人之际 ”，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继承了先秦以来所谓 “ 天人相分 ” 的唯物主义传统的。他反对天道可以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种观点是与当时汉武帝所提倡的被视为儒学正宗的所谓 “ 阴阳五行 ”、“ 天人感应 ” 学说相对立的。

正是由于司马迁有这种 “ 天人相分 ” 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此，他在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对人事、人谋作仔细的观察和记载，并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也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够保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的一个原因。

在 “ 通古今之变 ” 方面，司马迁《史记》也表现出许多进步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所谓 “ 通古今之变 ”，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与董仲舒 “ 天不变，道亦不变 ” 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变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变法，“ 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实行社会改革，打击了旧族势力，实现了富国强兵。司马迁称赞吴起的政绩说：“ 诸侯患楚之疆 ”（《史记 · 吴起列传》），即吴起改革后，楚国强盛了，使诸侯各国都畏惧了。商鞅在秦孝公六年（前 356）实行变法，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 居五年，秦人富强。 ”“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 对于吴起和商鞅这两个人，司马迁在感情上并不喜欢他们，批评他们 “ 刻暴少恩 ”，但对他们变法的政绩则是肯定的，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变革促使了历史的前进。

司马迁写作《史记》，据他自己说是要 “ 成一家之言 ” 的。“ 所谓 “ 成一家之言 ”，就是说他要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出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理想。司马迁写《史记》自许是很高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的理想，是要使他自己成为第二个

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春秋》这部书，在我们今天看来，不过是编年体的鲁国历史大事记。但在司马迁当时却不是这样的看法；当时一般认为《春秋》一书是孔子晚年寄托自己一生的理想之作，所谓“因史记（指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意思是说作为王法的《春秋》传门记述了天下国家政治上得失的情况，而且表现出所以成功或失败的道理，记载的道理很深，说得很清楚，不用过多的解释，内容就非常明昭。而且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可以明辨古代贤君的治国之道，还可以辨明社会、人事之间当遵守的纲纪，辨别疑惑难明的事理，表明是非区别，决断迟疑不决之事，以善为善，以恶为恶，以贤为贤，尊重贤者，贬斥不肖之人。也就是说它含有“微言大义”，是有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是存褒贬于其中的。当时的人还认为，孔子之所以借作《春秋》写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我与其凭空地发议论，还不如通过具体历史事实来表明我的见解和理想更为深切明白。这是当时一般人对《春秋》的看法，同时也正是司马迁写《史记》要窃比《春秋》的意思。由此可知，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又主要是靠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史记》是纪传体史学，它主要是用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生平活动来反映历史情况的。《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以及各种职业的各式各样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贵戚豪门和富贾，也写了平民。它写了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写了刺客、游侠、倡优和占卜的人。他还写了农民起义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几乎在每个人物身上都表明了作者的态度，表现了作者的褒贬、爱憎的感情。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司马迁《史记》以前的历史著作，或系年纪年，或分国记事，虽然也写到许多人物，但一般都流于片断，不够集中，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人物是做为某一历史事件的附庸而出现的，目的只在记述某一时期发生了某事，在某事件中有某些人物在活动而已。因此，它们虽然也写到一些人物，甚至在某些篇章里也较生动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但总地说来，是分散而不完整的，给人的印象是不够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采取了以写人物为中心，即用记录人物一生事迹的办法来反映历史情况。这样，它就有可能更充分更集中地刻画人物性格，并较完整地写出人物的一生和命运。因此，司马迁的这种主要以写人为对象的纪传体的创立，就更接近做为“人学”（高尔基语）的文学，也就是说，它与文学的主要靠描写人物来反映生活的这一特征，在精神上有更多的一致性。

我们知道，历史与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他们分别表现出人类两种不同的认识形式，前者属于科学的范畴，后者是艺术的范畴，而《史记》的人物传记则是它们巧妙的结合和统一。也就是说，《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中外文学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卓越作家的名字，往往是与他作品中的一些具体的、个性鲜

明的主人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说到曹雪芹，就会联想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提到托尔斯泰，就会使人联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卡秒莎·玛斯洛娃。同样，提到司马迁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到项羽、李广、刘邦、陈涉、张良、韩信、廉颇、蔺相如等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史记》在传记文学中所达到的这一境界，也正说明它是完全可以侧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散文作品。它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崇高的地位。

从史学上讲，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从远古传说时代写到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也就是说它是第一部从古至今（对司马迁而言）的伟大历史巨著。同时，它还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它以传记体的形式，比较完善地记载了汉代当世和以前的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种种活动，使后代对这些人物有史可察，有案可稽，这乃是一个极为巨大的贡献。而且它所记述的人物，既有上层贵族人物，也有社会下层人物；不仅写汉族，也写少数民族；不仅记中国，也记当时接触到的外国。因此，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或所包括时代的长远上看，《史记》都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世史家的优秀楷模。宋代史学家曾评价《史记》一书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南宋郑樵《通志·总序》）后来清代史学家越翼也认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卷一）事实上，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以至《清史稿》这一系列的史书，在某些名目和门类上尽管有所改变，但基本上都沿袭的是《史记》的体例。

从散文的发展史上看，司马迁把中国的历史散文推向一个新高峰。《史记》以前，著名的历史散文名著已有《左传》、《战国策》等。《传记》把《春秋》中一条条简单记事，铺张成为有细节描写和人物活动的叙事文，反映了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增强了形象性。但《左传》的叙事为年月所分割，限制了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语言也不够流畅浅近。后来《战国策》在叙事和人物形象描绘上比较生动，但也还是片断的、不完整的。而《史记》无论是写人物，记场面都十分集中、完整；故事性强，结构谨严，匠心独具。语言也平易简洁，生动传神。它不但对历史散文有影响，而对唐、宋以后的古文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唐、宋古文家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和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即曾标举《史记》为典范。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清的古文学家，无不熟读《史记》，受到了《史记》散文的熏陶。

小说和戏剧同样受《史记》影响。《史记》传记中的故事化手法原具有小说的特点。它在人物的塑造、性格的刻画方面，人物对话的声口毕肖，以及细节的描绘和情节的安排等方面，都给后世小说家以很大启发。《史记》又是元明戏曲的一个重要题材来源。这说明《史记》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

为奴隶起义领袖树碑立传——《罗马史》

斯巴达克是 2000 多年前古罗马奴隶起义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他领导的奴隶起义，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给罗马奴隶主以沉重打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起义失败后 100 多年，罗马杰出历史学家阿庇安撰写了一部《罗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